

关于构建中国边疆学的几点思考

周伟洲

本文将中国边疆学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时期。认为在 21 世纪至今第三个时期的第二个阶段现代中国边疆学的构建已初见成效,国内学者对中国边疆学科的定义、内涵、架构及研究方法已基本达成共识,只是对历史上中国的边疆有不同的认识。在此基础上,作者针对目前构建现代中国边疆学迫切需要做的工作提出了七点建议。

关键词 中国边疆学 学科建设 思考与建议

作者周伟洲,1940 年生,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地址: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邮编 710062。

一、中国边疆学发展历程及其特征

中国边疆学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1)萌芽时期,即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兴起的西北史地研究之学及 1840 年鸦片战争前后开始注重对边疆地区的研究;(2)初步形成和发展时期,即 20 世纪 30 至 40 年代,以“边政学”为主的边疆研究,从理论和方法等方面,初步奠定中国边疆学基础;(3)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中国边疆研究繁荣及重新构建现代中国边疆学学科的时期。

第一个时期:中国边疆学的萌芽时期。

早在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兴起的西北史地研究之学及 1840 年鸦片战争前后学界开始注重对边疆地区的研究,可以说是中国边疆学的萌芽时期。当时清朝一部分有识之士,包括任职的官吏、文人学士,鉴于中原与西北边疆民族接触日益增多,迫切需要了解其情况,以“安邦定国”。因此,这一时期以西北史地及研究边疆民族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论著、译著大量问世,涉及的领域构成了今天称之为中国边疆学的主要内涵。

比如,以考据之学研究西北史地的,有宦游从征者的著述:七十一《西域闻见录》、松筠《新疆疆域总叙》及其命徐松所撰《新疆识略》、汪廷楷《西陲总统事略》、和瑛《三州辑略》。遣戍者的著述:洪亮吉《天山客话》、纪昀《乌鲁木齐杂记》和《河源纪略》、林则徐《荷戈记程》、祁韶士《西域释地》。其他方面的著述:傅恒等《皇舆西域图志》、《西域图文志》,齐召南《西域诸水篇》,沈垚《元史地理志释》、《水经注地名释》、《西游记金山以东释》、《西域小记》等,李兆洛《历代地理韵编》、《外藩蒙古要略序》,张穆《蒙古游牧记》,魏源《圣武记》、《元史新编》、《西北边域考》、《外藩疆考》、《西征布鲁特记》、

《新疆后事记》，何秋涛《北徼汇编》、《朔方备乘》、《元代西北疆域考》、《哈萨克述略》，洪钧《出使各国》、《元史译文证补》、《中俄交界图》，邹代钧《西征纪程》、《中俄界记》、《蒙古地记》，沈曾植《元朝秘史注》、《蒙古源流笺证》、《元经世大典西北舆地考》、《岛夷志略广证》等。

这一时期边疆研究的特点，仍然是沿袭中国史学研究的传统，没有脱离历史学的范畴，不过更加重视“经世致用”，也开始注意西方的研究成果。尽管如此，对于中国边疆学来说，仅是打下了一些基础，处于萌芽的阶段。

第二个时期：中国边疆学的初步形成和发展时期。

从清末“新政”到民国北洋政府时期，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侵略的深入，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加深，中国近代化艰难的推进，西方近代文化也传入中国。其中，与中国边疆学相关的是，通过国内的精英（主要是留学生）将西方的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理论和方法传入中国。20世纪30至40年代，在西方列强，特别是日本侵华的抗战时期，中国的边疆地区首当其冲，为日本等列强侵略和宰割的对象。在这民族和国家存亡的关头，全国各阶层，特别是国内有识之士，更加关注边疆，一时关于边疆的论著如雨后的春笋，纷纷出版发行，各种报刊均有关于边疆的报导和评论。其中，有承袭中国史学传统撰写的边疆史地著作，如顾颉刚和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葛綏成《中国边疆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蒋君章《中国边疆地理》（文信书局1944年版）、童书业《中国疆域沿革略》（开明书店1946年版），等等。

同时，有关边疆的学术团体及其所办刊物也纷纷面世，如影响较大的中国边疆学会及其创办的刊物《中国边疆》月刊（重庆总会办）及《边疆周刊》（成都分会办）；新亚细亚学会及其所办的刊物《新亚细亚》，中国边政学会及其创办的《边政公论》等等。在20世纪40年代全国各地许多高等、中等学校及训练班开设了有关边疆的课程，而中央大学、西北大学于1944年增设了“边政学系”，专门培养为边疆服务的人才。此外，当时许多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及一些自然科学家纷纷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除当时流行的“边政学”的学科名称外，同时也出现了“边疆学”的名称，如1933年在《殖边月刊》上首次出现此名称，但影响不大。

在这一大的背景之下，作为中国边疆学的前身中国边政学这门学科的理论构建也初步完成，其标志应是时任蒙藏委员会顾问兼中国边政学会常务理事的民族学、人类学家吴文藻先生在1942年发表的《边政学发凡》，^①以及民族学家杨成志在1941年9月发表的《边政研究导论——十个应先认识的基本名词与意义》。^②《边政学发凡》提出边政学的定义是：“边政学就是研究边疆政治的专门学问。通俗地说，边疆政治就是管理边民的公众事务。用学术语，边政学就是研究关于边疆民族政治思想、事实、制度及行政的科学”。文中对边疆研究的性质、目的，边政学研究的内容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做了阐述。除上述提到对边政学研究有代表性的学者外，还有华企云、凌纯声、黄文弼、马长寿、梁钊韬、方国瑜、徐益棠、李

① 《边政公论》1942年第1卷第5、6期合刊。

② 《广东政治》1941年第1卷第1期。

安宅等。^①

显然,边政学突出的是边疆的政治、治理问题,与今日所说的边疆学定义有一定的差异,这是与当时边疆的形势有关,但其也包括了对边疆地区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研究的内容,与现代中国边疆学的概念及内容可以说基本相同。因此,笔者认为,这一时期边政学理论的构建和实践,是中国边疆学初步形成的时期。其特点,是在当时边疆危机、民族存亡的关头,上自政府下至一般百姓均关注边疆问题,边疆研究蔚然成风。这一时期的边疆研究已由过去传统历史学之下的史地之学,逐渐形成为由新的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理论和方法所主导,多种学科综合的新的学科——边政学。

第三个时期:中国边疆研究繁荣及重新构建中国边疆学学科的时期。

1949年新中国建立至1979年改革开放,由于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学科而遭到忽视,加之对国民政府时期的历史认识、研究不够等诸多原因,中国的边政学或边疆学几乎再未提及,更勿论这一学科的构建和发展。但是,这一时期对边疆地区的研究仍在继续。比如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其中大部分为边疆地区)颁布的一系列法规,包括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政策,促进了边疆社会的发展与变革等。又如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及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少数民族五种丛书”的编纂;70年代关于帝国主义(主要是沙皇俄国)对中国边疆侵略的研究;与中印、中苏边境的反击战相关的研究,等等。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边疆研究又提上日程,以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名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专门机构为标志,边疆研究又开始逐渐走向繁荣时期。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边疆研究又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至世纪之交。这一阶段边疆研究虽然以“边疆史地”的研究为主,但重点逐渐向边疆的现实研究转变。笔者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1期“笔谈专稿:面向21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中发表的《世纪之交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回顾与展望》^②对20世纪90年代边疆研究的业绩做了如下回顾:(1)“研究领域的扩大及发表、出版论著增多”。(2)“边疆史地研究与现实紧密结合、基础理论与应用研究的紧密结合,直接面对现实边疆出现的新问题、新形势,闯出了一条与边疆史地学直接为现实服务的路子……这可以说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在90年代以来取得的重大突破和最重要的收获之一”。(3)“过去边疆史地研究的主要困难,是人才的匮乏和研究经费困难。随着我国经济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以上困难得到了缓解”。(4)“90年代以来边疆史地的资料的整理出版也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

但是,主导这一阶段边疆研究的仍然是边疆史地之学,虽在实践上有所突破,然于中国

^① 关于民国时期边政学及边疆研究,过去研究不多,20世纪末才开始引起学界的注意,发表的论著日益增多。如马大正、刘逊:《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符雪红:《20世纪中国边政研究与边区开发理论评述》,《学术探索》2004年第9期;王利平等:《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边疆和边政研究——李绍明先生访谈录》,《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12期;段金生、董继梅:《试论南京国民政府边政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时局与边疆:民国时期边政学的发展历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年第3期等。

^② 此文被《新华文摘》2001年7月号全文转载。

边疆学本身的理论构建,除少数论著之外,^①却无多建树。于是在世纪之交,国内学界重新构建现代中国边疆学的呼声不断。就在上述笔谈中,时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的马大正先生等就提出“中国边疆学的建立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笔者在上述笔谈稿中也提出:“加强本学科的建设,特别是理论建设……真正构建科学的具有特色的中国边疆学的理论体系,应是21世纪边疆研究一项重要任务。从现实意义及学科发展等方面看,我认为正式将传统的‘边疆史地’更名为‘边疆学’的时机已基本成熟。即是研究单位及刊物名称也应将‘史地’两字去掉。中国边疆学,名副其实地将现实边疆问题纳入研究范围内,即以古今边疆为其研究对象:它既是一门单独的、专门的学科,又是一门综合、交叉的学科。这门学科的理论构建,将更有利于学科的发展,也是21世纪时代的需要”。

第二个阶段从2001年至今,中国边疆研究更是处于繁荣时期,特别是处在西部边疆的新疆、西藏地区,“疆独”、“藏独”的分裂活动及合流,严重影响到该地区的社会稳定和发展,边疆问题在新的形势下再次凸现。这一切促使边疆研究重心转向边疆现实的研究;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学者纷纷加入边疆研究之中,使原来以历史学为主导的边疆研究向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向发展;发表、出版有关边疆的论著数量和质量超过以往任何时期。云南大学、南京大学也在历史学一级学科之下,自行设立中国边疆学的二级学科,招收和培养研究生等。

在重新构建中国边疆学的理论研究方面,这一阶段更是取得很大的成绩。除开始对上世纪“边政学”的研究之外,对如何构建现代中国边疆学学科的研究更是取得大的突破。其中,贡献最大的首推马大正先生。他从2001年开始,先后发表十余篇关于构建中国边疆学的论文,如《关于构筑中国边疆学的断想》、^②《深化边疆理论与推动中国边疆学的构筑》、^③《我的愿望是构筑中国边疆学》(马大正访谈录)、^④《关于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几个问题》^⑤此外,他在主编的《中国边疆经略史》^⑥的《“中国边疆通史”丛书总序》中对“边疆”含义做了理论的阐释等。^⑦在上述论著中,马大正先生一再强调“创立一门以探求中国边疆历史和现实发展规律为目的新兴边缘学科——中国边疆学,这就是肩负继承和开拓重任的中国边疆研究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他认为,“边疆学,它不仅仅局限在历史学,实际上是一个多学科的交叉边缘学科……边疆学研究既有基础研究又有应用研究”。“中国边疆研究的主要任务,一是研究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和发展的规律,二是研究中国疆域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在构建中国边疆学理论方面也发表了一些论文,提出了有益的意

① 如邢玉林:《中国边疆学及其研究的若干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1期;马大正、刘逊:《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②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3期。

③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1期。

④ 《北京日报》2007年10月8日。

⑤ 《东北史地》2011年第6期。

⑥ 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⑦ 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第1—3页。

见。如李国强《中国边疆学学科构筑的透视》、^① 方铁《论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等。^② 特别是与中国边疆学理论构建相关的还出版了一批专著,如郑汕《中国边疆学概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吴楚克《边疆政治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罗崇敏《中国边政学新证》(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梁双陆《边疆经济学——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中国边疆的发展》(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等。其中郑汕《中国边疆学概论》是一部构建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的专著,明确提出,中国边疆学是以中国边疆为研究对象的多学科、多领域的系统学科,既是底定中国疆域的理论学科,又是总结底定边疆历史经验的学科及新兴的社会综合学科。他在书中对中国边疆学的研究方法及架构体系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③

这一阶段,构建中国边疆学学科的实践,也开始起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正式出版了名为《中国边疆学》(第1辑)^④的刊物,并申请了“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的创新项目(2013年);南京大学、云南大学也继续招收中国边疆学或边疆研究的研究生,等等。作为重新构建的现代中国边疆学学科,可以说已从“呼之欲出”,走到了“初见成效”的阶段。

二、中国边疆学学科基本理论的构建

通观上述中国边疆学发展历程及特征,事实上,20世纪30至40年代的“边政学”已经初步奠定了中国边疆学的理论基础,因此笔者对21世纪构建的中国边疆学,称之为“重新构建的现代中国边疆学”。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特别是21世纪国内学者对构建现代中国边疆学学科的不懈追求,目前在中国边疆学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框架上已达成共识。这些共识,虽然在表述上有所不同和个别问题上有不同意见,但其基本含义或精神是一致的。这些共识,主要有以下几点:

(1) 关于现代中国边疆学的定义(或称为概念、定位等):中国边疆学是研究中国历史及现实中国边疆(包括陆疆和海疆)的一门综合、交叉的学科。^⑤它既是基础学科,也是实用的学科。

(2) 关于中国边疆学研究对象“中国边疆”的解读。首先,关于“边疆”的含义,学者有各种解读。按各类辞书及学者的通俗解释:边疆,“边境之地”,或是“靠近国界的领土”,“一个国家的边远地区”,或云离京师较远的领地,较远靠近国境的地区及地带等等。这都没有错。实际上,“边疆”的内涵极为丰富,且与边疆学综合、交叉学科的性质是密切相关的。

从纵的方面看,边疆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有自己形成、发展变化的历史,这应是其与历

①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②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2期。

③ 参见该书绪论部分;陈明富:《首部探索构建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的专著——评郑汕教授〈中国边疆学概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年第3期。

④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⑤ 学者不主张用“边缘学科”的说法。

史学关系密切的原因。因此,中国边疆史地学、边疆考古学当为中国边疆学的主要分支学科;它事实上,也涉及到历代对边疆的治理,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与许多学科相交叉。

从横的方面看,边疆又是一个地域的概念,是一个国家疆域内区别于其他地区且邻近边界的地区,有它独特的地形、气候、矿产和生态环境等自然条件。这与自然科学中许多学科(地理学、地质学等)相关,也包含了这一特殊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诸多方面的问题。

边疆又是一个政治的概念,因为它是国家领土的一部分,有边疆的政策、治理(包括行政建置)及思想、边防等与政治、军事、外交等有关的内涵,于是有“边政学”或“边疆政治学”的分支。

边疆又是一个地域经济的概念,有其独特的经济类型、生产方式、对外贸易等内涵,于是有“边疆经济学”的分支。

边疆又是一个社会和民族的概念,边疆独特的社会阶层、组织、结构,边疆民族的形成、发展及其经济、文化、宗教,甚至跨国民族等也皆为边疆的内涵之一。于是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介入边政学的研究之中。现今“边疆民族学”、“边疆人类学”、“边疆社会学”等分支也必将兴起。这些分支学科与现实边疆研究结合更为紧密,越来越为社会所关注。

边疆又是一个文化的概念,边疆地区独特的文化及与域外、内地的文化交流、边疆文学等,也是其内涵之一。^①

总之,以上对“中国边疆”的解读,可以视为中国边疆学学科之内涵及各分支边疆学构建的架构,也是对其作为一门综合、交叉学科的注释。

(3) 关于中国边疆学的研究方法。一般认为既然中国边疆学是一门综合、交叉学科,其研究方法应如马大正先生所说:“从研究方法言,是多种学科研究方法的整合”。^② 需要补充的是,在研究中国边疆时,视其研究内容有时会偏重某一学科的方法,同时兼采用其他学科的方法。如研究边疆治理,则主要采用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而兼用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

除了上述的共识之外,还有的学者以“底定边疆”、“经略边疆”为纲来认识和解释中国边疆学,^③ 均对研究中国边疆学有所启发。然而,对中国历史上边疆的认识上,学术界仍有分歧,未取得共识。下面笔者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关于中国历史上边疆问题,实际上也是历史上中国的疆域问题,因为只有有了疆域,才会有所谓的边疆。历史上的中国(即古代中国)是否有不断变化的疆域和边疆?又怎样确定古代中国的疆域和边疆?目前国内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的边疆只是在近代“民族国家”出现时才形成的,即清朝乾嘉时才确定中国的疆域和边疆,在此之前都是中国边疆的形成期,即是说根本没有古代中国的疆域和边疆,有的只是古代中国封建王朝的“天下观”下的“天下”,或是一些大大小小的“政治实体”;或是在今天或清乾嘉时形成的疆域和边疆。

① 以上可参见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第1—3页。

② 马大正:《关于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几个问题》,《东北史地》2011年第6期。

③ 参见郑汕:《中国边疆学概论》绪论部分。

而国外学者如拉铁摩尔及其后继的学者,本着近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民族国家”论,认为古代只有汉族建立的政权(古代国家)才是古代的中国,而其他民族如契丹、女真、蒙古、满族建立的政权不是古代中国,而是异民族统治中国。即是说,在古代,只是汉族建立的政权才有古代中国的疆域、边疆,于是古代长城两边成了农耕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分界点,构成了两边的边疆地区等。^①

至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者对古代中国边疆的认识有所前进。如由德国傅海波(H. Franke)、英国崔德瑞(D. Twitchett)主编之《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一书“导言”中,在论及唐朝北部边疆时,认为即便是唐朝权力的巅峰时期,用现代主权观和划出一条现代意义上的国境线,“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相反,那是一条宽阔的过渡地带,在这个地带内,所谓同一性、忠诚和权力都在不断改变着与冲击着新的平衡”。^②“唐代中国的‘边界’(边疆)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于是存在着不变的“生态学边界”、唐朝军事防御体系的界线和文官管理的界线。^③“导言”中所说古代中国的边疆(边界)不同于近代“民族国家”的有明确主权和边界线,而且古代中国边疆是处于不断变化,时伸时缩,平衡经常被改变等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说古代中国,如唐朝的北部边疆是多层次的概念,则否定了边疆存在的事实,因为古代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有其政治权力控制的领地(疆域),有可以划出其大致控制的边疆地区。所谓“边疆”、“边界”的确定首先是国家政治概念,其次才有边疆的民族、文化等含义。这也许是中国与西方对“边疆”语境认识的差异。

笔者认为,古代中国至少从秦汉时起,就是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也即是“多元一体”的国家,有统一和分裂,而至近代最终统一,形成为近现代的中国。古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及其分裂时各割据政权都有自己的疆域和边疆,而且发生着变化。这即是古代中国的疆域和边疆,也就是中国传统史地之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而现今国内学者多持一种观点,即认为研究古代中国的疆域、边疆,不能用近代主权国家(即“民族国家”)的概念来解析古代中国的疆域、边疆问题。近代主权国家,按西方学界的理论,主要由人民、领土和主权三要素构成,自然古代中国或古代世界各国不能以此来解读其疆域、边疆问题,但是古代国家与近代国家,都是国家,且近代国家是由古代国家发展而来。用“国家”(或称之为“政权”、“王朝”、“汗国”等)来解读古代国家的疆域及边疆问题,则应是合乎历史事实和科学的。

关于国家的产生及本质、功能等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较为详细的论述,西方学者也有论述,在这里不做讨论。关于国家有政治统治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则是公认的。问题在于古代国家是否有其一定的控制、管理的范围,即是否也有疆域、边疆的问题?作为有政治统治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的古代国家,其统治和管理应有一定范围和人民(包括各民族),这是常识。中国正史中的《地理志》所记述的各种地方行政制度(如分封制、郡县

① 参见日本东亚所编、韩润棠等译:《异民族统治中国史》,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等。

② [德]傅海波、[英]崔德瑞编,史卫民等译:《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③ [德]傅海波、[英]崔德瑞编,史卫民等译:《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第9页。

制、羁縻制、土司制等等),即有大致的疆界、疆域和边疆,否则《中国历史地图集》就画不出来,画出也毫无意义。那么确定古代中国疆域或由此产生的边疆的标准是什么?笔者曾在《历史上的中国及其疆域、民族问题》中提出:“只能用一个国际上也通用的标准,即行政管辖,即只有历史上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管辖到的地方和民族,才是历史上中国的地方和民族。”^①当然,古代国家的行政管辖与近代主权国家的行政管辖不完全相同,但有行政管辖的范围,即疆界和疆域、边疆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古代国家管辖方式与其疆界和疆域没有近代主权国家那样严格,管辖方式及本质有所变化,近代国家边界与领土的观念更为强烈,且与国家主权紧密联系在一些。古代中国无论统一的或分裂时期的各政权都有一套管理自己控制地域(即疆域)的制度,其余古代世界各国均有自己特点的管理疆域的制度。就古代中国而言,先秦时期的封建分封制,到秦汉以后的郡县制和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执行的属国制、都护制、羁縻府州制、土司制等,就体现出古代中国对其疆域和边疆的管辖制度。正是有了这些管理制度,才使人们对古代中国的疆域、边疆确定有了一个较为明确的标准,即凡古代中国统一或分裂时期的政权管辖到的地域,即是古代中国的疆域及由此而产生的边疆。今天国内学界探讨的所谓“藩属体系”、“羁縻府州制”、“土司制”等,正是在确定古代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的归属及管理制度。^②

事实上,无论中国传统的史地学也好,还是 21 世纪以来一些重要的有关中国边疆的著作,如上述马大正先生主编的“中国边疆通史丛书”、程妮娜教授《古代中国东北民族地区建置史》(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等著作也好,都是与我们所论古代中国疆域和边疆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我们对国外研究中国边疆的成果,凡符合中国历史事实,有创见的观点,都应研究,取其精华,以充实构建中国现代的边疆学。但是,对他们歪曲和割断中国历史,如古代中国仅指汉族所建政权之类的谬论,则不能苟同,更不能以与国际接轨之类的借口,跟在外国学者后面,而抛弃了中国边疆学的传统和特色。

三、关于构建中国边疆学学科的几点建议

在今天重新构建现代中国边疆学学科初见成效的时刻,笔者建议目前迫切需要做以下工作:

一是继续探索构建中国边疆学学科的理论问题,通过争鸣和相互探讨,尽可能在一些重大理论上取得基本一致的意见。

二是在新形势下边疆问题日益凸现的今天,应更加重视和加强边疆现实问题的研究。

三是尽快成立全国性的“中国边疆学学会”及各分会,并出版有关中国边疆学的刊物。在 21 世纪边疆问题凸现的今天,成立边疆学学会,加强各地区、各相关机构的协作,更是十分迫切的任务。

四是继续在相关的研究机构及大学内,建立专门研究中国边疆的机构,并充分发挥其在边疆研究中的作用。进入新世纪后,除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① 周伟洲:《历史上的中国及其疆域、民族问题》,《云南社会科学》1989 年第 2 期。

^② 以上所论参见周伟洲:《关于中国古代疆域理论若干问题的再探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 年第 3 期。

(应改名为“中国边疆研究院”或“中国边疆研究所”)外,中国教育部所设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中,四川大学藏学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中心、兰州大学 and 新疆大学的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均与边疆研究相关。近来,又有一些大学设置边疆研究的机构,如云南大学成立的“边疆民族与边疆治理研究中心”,陕西师范大学成立的“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等。此类研究机构还可以在边疆省区专门筹建。

五是边疆研究的人才培养也十分重要。国家教育部的研究生教育学科分类中,欲将“中国边疆学”专门列为一级学科是十分困难,但是有一级学科的博士、硕士授权点的重要大学或上述重点研究基地,可依据中国边疆学为综合、交叉多学科的特点,在政治学、民族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一级学科之下,自行设置中国边疆学或其分支学科的二级学科点。事实上,云南大学、南京大学等学校早已经这样做了。今后,希望更多的大学设置中国边疆学的二级学科,培养更多、质量更高的边疆研究人才。

六是国家和有关边疆省区、大学等对边疆研究加大人力、财力的支持力度。关于此,目前发展势头很乐观。国家“2011 创新平台”、智库的启动,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各省区的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均应对边疆研究倾斜,以及启动边疆研究的各项重大项目,等等。

七是加强与国外边疆学研究机构和学者的交流,互派留学生、举办学术研讨会,等等。

希望尽快完成现代中国边疆学学科的构建,让它为中国(特别是边疆地区)社会发展、现代化的实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本文责任编辑 李大龙]

· 书 讯 ·

朱昭华著《中缅边疆问题研究》(修订版)作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国边疆研究文库”之一种,2013年5月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书曾经于2007年作为“边疆史地丛书”之一种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此次修订对绪论,第一章,第六章,第二章第一节第一部分、第二节第一和第二部分、第三节第一部分以及第五章、结语等在行文或注释方面进行了修改;删节了后记,增添了再版前言、附录(包括近代以来的中缅划界条约文本、文中涉及的主要地名和人名中英文对照表及中英文参考书目)等。修订部分超过了全书内容的30%。

该书利用大量档案资料,完整论述了近代中缅边界纠纷的来龙去脉,纠正了前人的一些谬论,对于了解中缅边界沿革史有着重要参考价值。